

文化推广：借鉴《江南Style》

问：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及，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推进，其中包括文化多样化，并要求扎实推进公共与人文外交。在文化推广方面，中国近年来在海外取得了一些成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您认为文化推广方面中国目前所作的努力如何？国外文化推广经验对中国有哪些启发？

叶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在海外遍地开花地建立孔子学院当然是我国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重要环节并且已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不过与今年韩国的一曲《江南Style》相比，我们的孔子学院在帮助推进文化外交方面还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

窃以为《江南Style》的成功无非是用全球化时代全世界人们都能接受的大众娱乐形式，在内容上表述全球化时代“中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人们共同的、或者是普遍的喜怒哀乐——既怒富人也哀自身并以喜剧性的自我嘲讽来苦中作乐，颇有些像搞笑版的占领华尔街。但这一切却又是通过韩国特有的符号——“江南村”、韩语及演唱者本人奇特的马步等方式来表达，因此切实地帮助了韩国进行文化推广。《江南Style》的这种“style(方式)”——将普遍的与特殊的，共同的与个别的，世界的与本国的，全球的与地方的相互结合——是韩国近年来能成功地推进其文化外交，树立良好的韩国形象、切实增强自身软实力的一个典型范例。这或许应该对我今后继续办好孔子学院，扎实推进公共与人文外交有些许启发。

中国软实力

公共外交：瑕不掩瑜亮点频出

问：什么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有哪些作用？今年我国公共外交方面的亮点有哪些？我们也注意到，今年发生了中国人在国外发生的一些公共外交负面事件。对此，中国老百姓应以何种心态来看待？普通人作为公共外交的行为体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主要以他国公众为对象所开展的对外工作，其目的在于提升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公共认同。我国传统上将此称为“人民外交”，但公共外交的外延超出“人民外交”。十八大报告首次使用了“公共外交”这一语汇，提出要将公共外交当作促进中外相互认知的重要手段。扎实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向世界说明中国，把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推向世界，是我们时代的重要工作。

2012年，我国在公共外交上有着诸多亮点。最为突出的是围绕钓鱼岛问题，我国向世界说明为什么钓鱼

岛属于中国的历史原委和法律依据，因此国务院新闻办在9月28日发布《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国土》白皮书，这是在中日钓鱼岛危机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钓鱼岛的官方声明。白皮书详实列举了我国对钓鱼岛最早发现并实施管辖的一系列证据，驳斥了日本对于钓鱼岛主权的非法要求，并指出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是完全不合法的。白皮书以中、英、日文版发行，有利于向世界说明我国的严正立场，这就是我国今年最大的公共外交亮点。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访美时回到他1985年访问过的艾奥瓦州马斯克林市，与曾招待过他的美国朋友重聚，并特别会见了当时的房东德沃切克夫妇。习近平在华盛顿特区出席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发表演讲时，特别讲述了他1992年促成了美国友人加德纳夫人来华访问的故事，全场激动不已，中美听众为中国领袖尊重美国友人及珍惜中美关系的高尚情感滴下热泪。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极为成功的公共外交。

至于中国公民今年在海外发生的消极事件，我们要正确对待。第一，这是我国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难免的。我国正处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中，但平均水准还有待显著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即使在我国实现了工业化之后，也还有待公民素质的继续提高。我国公民在海外具有罢工的权利，但是必须依照所在国家的相关法规，这样才能合法并有效地保护自身权益。对我国留学生在海外被枪杀，事件虽然消极，但责任不在我方，这是事件发生国枪支泛滥的社会痼疾。即便如此，我国留学生还是需要自身注意安全防范，以免受到损害。对于国人在境外的飞机上打架，确实值得我们三思。在公共场合克制个人行为以维护公共秩序，是公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的大城市，这种教育的效果还相当不足，这同我国尚未实现工业化、公民与社会的契约责任远未建立有着很大关系。



自从今年7月发布后，《江南style》在YouTube的点击率达到惊人的8.8亿次，并史无前例地横扫欧美各大音乐排行榜。随着《江南Style》流传全世界，演唱者PSY成为今年最红的歌手。

《江南Style》不仅是一个文化产品，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所评论的，它已变成帮助推销韩国出口商品，包括饮料、化妆品乃至电器的文化品牌。对韩国政府来说，《江南Style》俨然成了其在软实力建构上的标志性成果，验证了“以文化产品输出带动软实力建构”战略的正确。

千年目标：中国作出双重贡献

问：今年联大第67届会议开幕的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千年发展目标倡导小组汇聚联合国总部，探讨在2015年之前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成为最近各国主流媒体热议话题。它对于国际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在这方面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

叶江：千年发展目标是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峰会上由与会147个国家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提出的行动和目标，是联合国为回应世界面临的主要发展挑战而提出的世界各国需要在2015年达到的8个发展目标，目前已被189个国家接受。千年发展目标的8个方面包括：1. 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2. 普及小学教育；3.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4. 降低儿童死亡率；5. 改善产妇保健；6. 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对抗；7.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8.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2010年6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推进2015年后联合国的发展

新议程，发起成立了千年发展目标倡导小组，协调2015年后联合国继续推进发展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就2015年后相关议程提供建议。该小组成员均为国际著名人士，既有政治家（该小组双主席之一、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也有企业家（印度信实工业主席、全球富豪之一穆克什·安巴尼），慈善家（CNN老板泰德·特纳），社会活动家（发起绿丝带运动的旺加里·马塔伊），著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知名女性（卡塔尔王后玛斯纳德）及演艺明星（英国摇滚歌手鲍勃·盖尔多夫）等。今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出任名人小组另一位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前副外长王英凡也是其中一员。从我国资深外交官加入该倡导小组并积极参与活动可见中国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施及对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予以充分支持。

张海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减贫行动和发展

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框架，但目前距离目标日期不到3年，多数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渺茫。根据联合国《2012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目前只在贫困人口、贫民窟、饮用水的3项具体目标提前实现。为此，联合国建立了致力于2015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名人小组。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涉及未来国际社会在发展议题上目标设定和共同行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上的根本分歧在于：是继续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础设立未来发展议程？还是另外设定一套全新体系取代千年发展目标？发达国家希望另起炉灶，重新分配责任，转嫁历史欠账，将未来的发展责任更多地分摊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延续千年发展目标，继续推进以减贫为核心的发展议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督促发达国家信守发展承诺。

2015年后发展议程关系到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但发达国家对其援助承诺落实迟缓，《蒙特雷共识》确定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一直是句空话，除了少数北欧国家达标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对外援助非但未达标，还呈现减少趋势。

根据2008年《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国已提前实现贫困人口减半和普及初等教育等目标，在卫生、性别平等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快进展，有望在2015年前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作为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对世界稳定与发展、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最大的贡献。

中国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在资金、技术、人力等各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成果。因此，中国的贡献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自身发展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切实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问：在今年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主张，赢得广泛国际赞誉。中国此番在气候大会上的举动亮点有哪些？会带来怎样的效果？

叶江：当前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主要的矛盾是否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发达国家是否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在年底的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坚决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础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必须如期启动，同时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应当尽快到位，发达国家还应加大减排力度。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并且尽自己的能力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

正是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多哈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实施，大会还通过了有关气候资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工作组成果、“德班平台”以及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方面的多项决议。

在资金问题上，多哈大会决议重申发达国家须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在2010年至2012年提供“快速启动”资金后，要继续增加出资规模，并在2020年前实现“绿色气候基金”每年入款1000亿美元的目标。

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用实际行动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加强了中国的软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中国努力下，多哈大会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核心原则的指导意义写入了有关“德班平台”的决议之中，但是，由于2011年联合国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将结束《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代表的“双轨制”谈判，并在2013年—2015年底转向单轨的“德班平台”谈判，因此发达国家在多哈大会之后将试图通过“德班平台”把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纳入同一个制度框架，模糊二者在减排责任上的区别。这可能将是来年乃至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谈判方面斗争的焦点，而中国也将因此而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气候变化：实际行动树立形象

